

百年经典
学术丛刊

张舜徽 撰

中国文献学

姚伟钧 导读

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从偏狭的领域中解放出来，拆除了“文献学”与“史学”森严的壁垒，恢复了汉唐历史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宏旨；他以登高一呼、学者认同的魅力，带领广大学界同仁开创了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基业，把历史文献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献学 / 张舜徽撰;姚伟钧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百年经典学术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6130 - 8

I. ①中… II. ①张… ②姚… III. ①文献学—中国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4085 号

百年经典学术丛刊

中国文献学

张舜徽 撰

姚伟钧 导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243,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600

ISBN 978 - 7 - 5325 - 6130 - 8

I · 2421 定价: 3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导读：张舜徽与《中国文献学》

姚伟钧

张舜徽先生一生治学范围十分广博，在文史哲各个学术领域都均有创见。但在张舜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研究领域，即是文献学研究，并以中国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蜚声海内外学术界。他的代表作《中国文献学》以及《广校雠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等，都是有关中国文献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并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文献学》一书，构建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体系、思想与方法，实为中国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

一、张舜徽的生平与治学道路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出身于书香之家。张舜徽的早期教育是在家中完成的，张舜徽先生在《八十自叙》中回忆说：“家世学业，祖若父皆喜聚书。两世所藏，四

部常见之籍略备。幼年读书家中,先君子亲授经传及文字、诂诸书。”^①父亲张淮玉是他在家里自学的指导老师。张淮玉,字小岩,历任常德官立中学堂、辰州官立中学堂、西路师范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等算学教习,在天文算法方面颇有心得,后因身体原因,暂辍天算探究,转而研究经史子集与古文辞义法。他思想开明,对于旧学新知都能兼收并蓄。张舜徽的姑父余嘉锡,辅仁大学教授,其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被学界公认为“四库学”之力作。张舜徽的叔祖父张闻锐,为光绪初年秀才,一生以教授为业,博览群书,在《易》学方面很有研究,他们对张舜徽的治学都曾予以许多帮助和影响。

家学渊源对张舜徽成为一名博通的学者有很大影响。张舜徽先生在谈到自己治学经历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十几岁时,发现张之洞《书目答问》里谈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恍然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②张舜徽先生的一生便是沿着这种路子来治学的,这种治学的次第步骤也是十分科学的。

清代学者将语言文字称之为小学,并把它看成是研究经学的基础知识,所以清代的经学家绝大多数都是精通小学的。张舜徽先生少年时,濡染家学,从小就打下扎实的小学基础,后来在小学方面也有深厚的造诣。他回忆说:“我在幼学时期,父亲便用王氏《文字蒙求》教我识字,对文字学便有了兴趣。十五、六岁时,看完段氏《说文注》、王氏《说文释例》和郝氏《尔雅义疏》。十七岁时,写成《尔雅义疏跋》一文,将《尔雅》与《说文》不同之处,以及郝氏《疏》的弊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又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将《说文》分抄了一遍,名为《说文类求》。再以古韵部居为经,声纽为纬,将许

书九千余文，系列为表，成《说文声韵谱》。又依陈澧所定四声类，将《广韵》按声归类，成《广韵谱》。复取《尔雅》、《小尔雅》、《方言》、《毛传》、《说文》、《释名》诸书内容，类录成《雅诂表》。这些，都是我早年练基本功时所做的具体工作。”^③

从张舜徽的学术成果中可以看到，张舜徽的学术根柢是古代经学，但是，他是从小学入手来研究经学的，他很欣赏清人提出的“由文字音训来明经达道”的主张，他引用顾炎武的话说：“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张舜徽认为，只有首先把古音韵学弄懂了，才能对古代经学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正如清代吴派大师惠栋所言：“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④

张舜徽先生利用深厚的小学功力，在解释古代文字时，往往以条贯通畅的演绎，光大了前人双声相衍释字原理。他还善于把古代小学的知识运用到群经的训诂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经学的研究，也为整理古代经典文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舜徽的学术虽以朴学为根基，但他对宋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他识字启蒙的第一部书就是朱熹注的《四书》。他认为：“人们每一提到宋代学术，便毫不例外地以理学为中心，以为空谈心性，可以概宋代学术之全。这是由于十八世纪中叶，当清代乾隆年间朴学蔚兴之际，一般学者专心力于考据，自命为‘汉学’，因之，同时又标立‘宋学’的名义来统括那些专言义理的读书人，而加以‘空疏不学’四字的评语，并大肆攻击。壁垒既立，门户便成，两百年来，在学术上渐成为可分而不可合之势。人们由鄙弃‘宋学’，便很自然地连宋代学术之全，也都看不见了。其实，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

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理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开辟了途径。”^⑤

对于宋学与汉学的纷争,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张舜徽先生视野广阔地审视宋学,对于人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宋学,无疑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张舜徽先生不仅肯定了宋学的博大气象,而且还指出了宋学具有朴实严谨的学风和接近科学的治学方法。他以大量的事实为证,说明宋学并不是清人所认为的“空疏之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代朴学来源于宋代学术,宋学实为朴学的先驱。

张舜徽研治学问从不拘守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学者的说法,在他的著作中都强调融会贯通的重要,不主张把学问的门类分得过于细窄,博通是张舜徽一生治学的追求和一贯主张,诚如黄宗羲所云:“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⑥当然,张舜徽也清楚,从汉初以至清末,学者们做学问的风气,就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博通的道路,一是专精的道路。专精的道路,在西汉时便是所谓‘五经博士’之学……这便替当时学术界带来了两种弊短: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谓局隘,便是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所谓破碎,便是死板地从文字上作些繁琐考证。”^⑦这便免不了出现一些错误,更谈不上融合贯通了。所以,张先生总是赞赏郑玄这样博通的人物,认为“郑玄没有融会各家经学的说法,怎样能沟通今古文,重新替群经作注解?这些人做学问的面本宽,和那般局限于专经研究的五经博士比较起来,知识领域便截然有广狭之不同……后世学者像宋代的郑樵、朱熹,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都是走的这条宽广的路”^⑧。

张舜徽先生一生博涉四部,并总是倡导走博通之路,然后再由博返约。这些思想和研究方法,在他留下的古代学术著作中都有深刻的体现,他在《八十自叙》中,曾对他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作过总结,他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特就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博物小书,不暇悉数也。”^①现在,我们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积累、睿智的议论和富于前瞻性的概括。同时,他所身体力行的博通之路,也为他构建《中国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体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一位在中国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文献学家。

二、《中国文献学》的源起

中国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探讨是从20世纪初开始

的。具体而言,“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三年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后来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即文献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基础,所做的工作是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为各学科提供材料,但还不是一门学科,只能谓之广义的史学,或是史学的基础。

在中国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他们在《例言》中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该书以结集、审订、讲集、翻译、编纂、刻印为主要内容,这与梁启超对文献学的理解不同,因此有人认为此书实质上是中国文献流布史,没有廓清中国文献的结构内涵。另外该书的体系结构缺少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古代文献学脱离“校讎学”之名的初期,理论研究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因而该书问世以后未能引起学术界必要的重视,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20世纪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问世,其内容主要是目录、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王欣夫先生把文献学看作一种方法的掌握,似乎范围有点过于狭窄。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张舜徽先生恰好在此时也进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丰收季节。这时正值“十年动乱”结束,百废待兴。在人文社会科学拨乱反正,取得诸多重大的成就之中,张舜徽的名字是与文献学学科的构建紧密地连在一起的。1979年,他

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据参与此次会议的崔曙庭教授回忆说：“在酝酿成立学术团体时，为了名称问题，颇费周折。当时大家虽然都是从事与文献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的，但是对于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是比较陌生的。是张先生在会中详细论述了文献学的内涵，并提出我们成立的学会，应定名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经过大家反复认真地讨论后，认为张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切合我们的实际，与我们从事的专业是一致的，于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就在桂林正式成立了，并且在会上一致推举张先生为首任会长。”^⑩ 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形势催促着他思索，如何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张舜徽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最大功绩，乃是他毕生对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卓越贡献。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科学史上每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总会出现新的“规范”（Paradigm），规范的作用就在于为研究学者们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每当学术迁演发展到关键时刻，历史总会推出某些代表人物来建立“规范”。建立“规范”的学者必须具备二大特征：其一，在具体研究上以空前成就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其二，规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范畴，并在该领域内“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就张舜徽的学术贡献而言，作为替中国文献学建立“规范”的代表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

三、《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文献学》一书,分为12篇、60章,这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人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兹就其理论建树略述如下:

(一) 阐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

中国文献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较晚,但“文献”一词在中国产生却很早,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汉宋学者注疏时都把“文”释为典籍,“献”释为贤人或贤人言论。如三国时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也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古代学者强调“征文考献”,就是说要了解历史,一方面应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则要查核耆旧先贤的见闻、言论。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对古代文献含义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述,起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①马端临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

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把“文献”二字用作书名，他是第一人。为何将“文献”名为书名，马端临在《自叙》中解释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在这里，马端临虽然仍把“文”与“献”对言，但区别仅在内容上，一为叙事，一为论事，两者都属于文字资料，形式上已无差别。由此可见，马端临所谓“文”即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即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与以前相比，“献”的含义不再专指贤才了。臣僚奏疏、诸儒评论等，实际上也都是写成文字的材料。这说明从孔子到马端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特别是书写工具的改进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广泛运用，贤者的言谈高见很容易见诸笔端，各种口头传说和议论也逐渐通过各种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表现为图书典籍的文字材料在文献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典籍而忽略传闻，相应地“文献”也由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逐渐向偏义复合词的方向演变。到明成祖朱棣编定《永乐大典》时，初名就是《文献大成》，这里“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和图书典籍等同了。

从上可见，“文献”是一个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名词，了解它的范围，对建构这一学科是十分重要的。张舜徽认为我们不应该抛弃文献本义而加入别的内容，他指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

把历史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业，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¹²他把有没有文字记载作为区别是不是古代文献的重要标志，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他廓清了对文献概念的种种误解，对文献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特别是把古迹等从文献中剔除出去，使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更清楚，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起着积极引导的作用。

张舜徽对“文献”范围的把握，还与他“史”字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史’字的本义，既是文字，那么，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都可称史料。”¹³又说：“史的范围既很广泛，不独一切书籍、报章、档案、信札、艺术品，以及金石刻辞等，都是宝贵的文献；即如老药铺里的药物价格，流水帐簿，大地主家里的田庄契约，收租和高利贷的簿据，可从其中考察若干年前的物价和一般生活水平，以及农民受压迫剥削的实际情况，也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问题的重要对象和可靠依据，值得人们重视。”¹⁴张舜徽先生把文献视为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材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文献的社会价值，提升了人们对文献的认识。作为一名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中重视文献的发掘与利用，这是张舜徽先生留给我们的一条宝贵的治学经验。

虽然中国文献资料极其丰富，但在流传的过程中，散失也是十分惊人的。古今典籍亡散之由，前人有“十厄”之论述，很

有价值,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所在。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对古今文献散亡的深层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1)由于重德轻艺的思想,使人们对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不够重视,导致了这类书籍的散亡。(2)由于古代传播文字的工具不够完备,书籍全靠手写,如有一种删繁存简足以概括多种内容的书籍出现,便会抛弃其他各家的图书。(3)由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对于朴实说理的书籍容易疏忽,从而促使这一类图书的散失。(4)由于事物不断向前发展,重修图书盛行,造成了原书的湮灭。(5)由于著书的人犯罪伏法或者身败名裂,为社会所不齿,他的著作也由疏远而遗弃以致于散亡。(6)由于藏书家过分看中孤本书籍,深闭固拒,不肯借人阅览,也不轻易让人知道,以致湮灭散佚。^⑮这六点,实为发前人所未发,是他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类别,传统上分为经部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集部文献和其他文献。这样的分类,从今天的角度看既不科学也不严密。张舜徽对古代文献的分类有自己的主张:“总的来说,我国古代书籍,不外两大类:一类是记载事实的书籍,后世名之为‘史’,一类是发表见解的书籍,后世名之为‘子’。后世书籍,虽然很多,但都是这两大类发展起来的。”^⑯表达了他独到的看法,因为“经”也好,“集”也好,都没有超越“记载事实”和“发表见解”的两大范围。张舜徽还从古代文献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考察,将其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大类,“三者虽同是书籍,但从内容实质上来看,却有高下浅深的不同”。^⑰著作是将感性认识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并得出精要的结论,著作最具创造性,也最有价值。编述是对材料剪裁熔铸而成,作用很大,古代文献中,这一类最

多。抄纂则是综录旧事异闻,或做一些订讹补阙的工作,虽然在学术研究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与前两类相比,高下浅深自见。这种看法,无疑是比较科学的,对于我们更好地阅读和使用文献,提供了一把有用的钥匙。张舜徽特别推崇《春秋》、《史记》、《史通》、《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典籍,是和他关于文献分类的观点相一致的,他认为这些文献在发凡起例方面功不可没。

(二) 中国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基础知识

张舜徽先生认为,中国文献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学科。虽然我国古代文献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形成一门学科体系,却是比较晚的事情。张舜徽提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⑧传统的文献学正是在综合校讎、版本、目录诸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这种认识,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这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这就是:“继承过去校讎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展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⑨张舜徽先生认为文献学要为文献整理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文献整理的历史。张舜徽第一次明确地阐

明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这是他对文献学这一学科作出的一大贡献。

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由一系列基础知识所构成的。那么，中国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包括什么内容，学习这些知识有什么用，这也是《中国文献学》一书中所介绍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列有专章，详细地论述了目录、版本、校勘这些整理古代文献必备的基础知识，他认为这些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中经常地、广泛地加以使用。

就目录学而言，它的功用在于方便文献的检索，可以使文献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为文献的利用服务。张舜徽先生总结了目录学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就是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目录学的重要任务。从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的工作来看，^②刘向当初就十分重视目录对总结与考镜学术思想的作用。所以他在撰写目录的过程中，除了说明整理编辑图书的经过外，主要是介绍作者，综述全书主旨，加以分析评论，并指出书的作用，这就成了学术史的一个片段。可惜这些目录大都已亡佚，现在只能见到《战国策》、《晏子春秋》、《荀子》等几篇残录，从中仍可看到西周以来我国学术发展的某些方面。刘歆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其卷首的《辑略》，可以说是先秦学术史上的简编。刘向、刘歆注重学术源流、书籍性质的思想，对后世的目录学的发展起着良好的影响，他们的成就表明，中国目录学一开始便是建立在高学术水平上的，无怪乎清人章学诚对此赞叹道：“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

不足与此。”²¹

《中国文献学》介绍了在刘向、刘歆部次群书写成目录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目录体例:第一是每部类有小序,书名下有解题的,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类。第二是有小序而没有解题的,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类。第三是没有小序和没有解题的,只登记书名的,如《通志·艺文略》及其私家目录之类。“这三大类目录书,体例虽异,宗旨则同,同归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²²张舜徽主张从学术源流和著述体例方面发挥目录的作用,不要局限于死记每书的篇目和版本的行款,这可谓道明了目录学的根本目标和宗旨。

张舜徽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目录著作不仅是研究目录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据,而且还告诉人们如何读书治学,因为中国古代目录著作多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揭示与报导文献内容,它不仅介绍作者取得的成就,以及流派和师授渊源,还阐明学术源流,区别学科范围,并通过这些为学者指引读书治学的门径。²³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²⁴他还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²⁵清代另一位著名学者江藩也认为,读书只有通过目录学的指导,才能选择到适合的关键性的图书,避免治学走弯路,劳而无功。他在《师郑堂集》中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如果不入目录学这个门,那么治学就难以取得成绩。所以,目录学受到历代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他们从

亲身的读书治学的实践中体会到，治学之道，宜得其门，得门而入，则事半功倍。为此，张舜徽先生还撰写了《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清人文集别录》及主编了《中国史学名著题解》等书，都是目录解题之作。他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经历，进一步论证了目录对于文献整理和指导人们治学的巨大价值。

张舜徽先生还认为，版本在文献整理中也有重要价值。所谓版本学就是研究各种文献版本的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各种版本的真伪高下的专门学问。学习版本学的知识，首先有助于读书，它使我们知道读书应重视版本，要选择善本，读书不注重版本会影响我们对原著的正确理解。其次，有助于引书和校书。我们在写作和研究中经常要引用文献，而引用文献必须注意版本，这里既有文献学的专门训练，又有学术规范的一般要求。至于用各种版本来校书，对于版本学的讲究，更无需多言。版本学对于研究学术发展史和思想、文化、经济史也能提供独特的视角。

张舜徽先生十分看重宋元刻本，但他并不迷信宋元刻本。他明确指出宋、金、元、明刻本不可尽据，“除了有错字，有脱句，也有经刻书之人任意增损的地方。如果认为旧本书一无讹谬，那就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⑤张舜徽先生强调版本的质量，所以非常重视精校本和精刊本。清代学者在校刊古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张舜徽先生对于版本有较深的研究，这是他文献学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舜徽先生认为在掌握了版本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后，才有可能进行书籍的校勘。所谓校勘，是指改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